


[\[科研成果首页\]](#) - [\[所有科研成果\]](#)

[项目类型] 专职人员科研成果

[成果题目] 论战后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走势

[作者姓名] 庞德良 段玉彬

[成果类型] 论文

[出版单位] 东北亚论坛第1期

[出版时间] 2004年02月

[成果摘要]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如“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构想。进入新世纪，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快，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也进行了调整，面临着几种选择：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中韩组成东亚区域合作体、与东亚各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无论哪种选择都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顺利实现区域合作重心的转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以及改变不合理的分工体制。

[成果全文]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深入地发展。2002年，欧元正式启动，欧盟经济一体化步入最高阶段。继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洲34个国家又宣布将在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欧盟和北美又都有将其经济联盟扩展至亚洲的想法。而东亚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制度性的合作机制，在全球区域化日益深化的潮流中，正急速落后于欧洲、北美甚至拉美。面对“内忧外患”，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前景堪忧。日本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它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如何，对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区域合作政策将对东亚的区域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在简要回顾日本区域合作构想与政策的基础上，就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勾画其东亚合作的前景。

一、战后日本区域合作的构想与实践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制定了“出口中心主义”的“贸易立国”经济发展战略。随着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与美国、西欧等贸易伙伴的贸易磨擦日益激化，推动和强化了世界经济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区域集团化趋势。为了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和在 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探索亚太经济合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合作构想。

(一)“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构想

1965年11月，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提出由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个国家组成“太平洋自由贸易区”，1979年由上述5国财界人士组成的“太平洋经济委员会”又把小岛清的构想推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主张。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东亚经济增长迅速，美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西移，开始对亚太地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日本官方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研究。1977年12月，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提出了《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日本的对策——走向21世纪的建议》，主张建立“太平洋经济圈”，建立由上述5个发达国家和东盟参与的合作机制。比较明确地说明了环太平洋合作设想的背景和合作课题。1978年，大平正芳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又把“环太平洋联合设想”作为政纲提出来，并在被选为总裁和总理大臣后，把这一构想提到了国策和外交的高度，并设立了“日本政策研究会环太平洋联合研究组”，作为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该机构在1979年11月和1980年5月先后提交了，《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作为官方的方案公布于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探索阶段，区域合作的对象主要局限于环太平洋的几个发达国家，其战略目标及其实施阶段性与层次性模糊不清，战略重点不确定，仍处于不断选择和探索之中。

(二)“东亚经济圈”的构想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经济突飞猛进，东亚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特别是日本经济经过长达18年的高速增长和其后的稳定增长，已经开始谋求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因此，日本这时的区域合作政策不再拘泥于以日美合作为基础，开始构筑自己的势力范围。1988年5月，竹下首相的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构想，主张由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5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10个国家组成，通过贸易、投资与货币“三位一体”的合作，组成以日本为领导的经贸集团。日本认为，“东亚经济圈”不仅会成为与欧美相抗衡的有力武器，也为自己提供了稳固的资源供应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一时期，日本完成了由协调者到组织者再到领导者的角色转换，开始寻求自己的势力

范围，一方面想与欧美两个经济集团抗衡，另一方面也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三）“东亚扩大共同体”构想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低迷之中，日本一直集中精力振兴国内经济，无暇顾及其它。同时也迫于美国压力，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如日本先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导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积极支持，后又因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表示反对。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夭折。这一时期，日本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合理可行的区域合作设想。自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为了提高日本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地位，也为了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日本在外交上忙得不亦乐乎，2002年4月，在日本进行完“东盟外交”后，又对越南、东帝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了访问。小泉先后同这些国家首脑就加强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了建立以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为基础的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东亚扩大共同体”的构想。小泉在访问中强调：“日本不能作旁观者，必须拿出主体行动来”。但是“东亚扩大共同体”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日本经济短期内不会走出低迷的状态，限制了日本在地区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日本农民是日本自民党最大的支持者，日本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否则就面临着下台的危险，因此日本很难开放它的农产品市场，农产品问题限制了日本与其它国家的自由贸易。最后，日本在构想中建议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作为核心成员，同时强调美国在其中应起的必要作用，引起了东盟国家的反对。使得日本的“东亚扩大共同体”的构想，缺乏实现的条件，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20世纪90年代不仅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也是日本在区域合作中“失去的10年”。

二、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走势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对区域合作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战略重点也逐渐向东亚转移。它一方面通过“10+3”会谈机制加强与中国、韩国和东盟的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探寻与东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但由于日本外向型的经济体制和美日的特殊关系，使日本在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着矛盾心理。面对欧洲大市场的形成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日本迫切希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以缓解西欧和北美的压力。同时，它又担心建立排他性的区域集团会遭致西欧和北美的报复，影响它的对外出口；同时担心会损害美日同盟关系，从而失去美国政治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保护。因此，它不愿意由它牵头组建东亚经济集团。它的矛盾心理决定了它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犹豫性和两面性，也决定了它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必然要走在中国的后面，使中国抢先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日本震动很大。东盟一直是日本重要的商品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日本重要的海上经济命脉，该地区历来被日本视为战略攸关的地区。日本势必要对其区域合作政策进行调整，加快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步伐。就目前日本的动态，我们认为日本今后的区域合作政策可能有以下几种选择：

（一）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争夺地区合作的主导地位

以前由于担心东盟的农产品对日本市场的冲击以及与东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日本一直对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不甚积极。但中国与东盟宣布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日本小泉内阁的“东盟外交”立即出台。2002年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相继出访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5个东盟国家，并在新加坡发表了被称为“东盟外交”的演讲，强调要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并将2003年定为“东盟外交年”。2003年9月中旬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召开的东盟10国经济部长会议上，日本与东盟就10年内尽早促成日本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达成协议，并计划从明年开始制定合作框架的政府间磋商。希望从中国手中夺回对东盟的外交主导权。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赇夫在文莱参加ASEAN贸易部长年会时表示，“部分ASEAN的部长在会议上表示，与日本形成FTA可能用不了10年，因此觉得时间表订得太长了，而几乎没有人反对在与中国形成FTA之前就完成与日本的关系。”如果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东盟、日本的出口将分别增长1.99%、0.07%；日本对东盟出口将增长27.5%，东盟对日本的出口可增长44.2%。

（二）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日本一直认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对它是一种威胁，担心其亚洲经济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因此，在它过去提出的各种区域合作构想中一直把中国排除在外，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时，也力图保持领先中国10-20年的水平。但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中心国家，经历了上百年落后挨打的局面，不仅有着强烈发展经济、壮大自己的愿望，也面临着当今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某一个国家所能左右的。

经过长期的贸易发展，东盟已成为日本稳固的原料、能源供应基地和商品出口市场，同时中国也已成为日本的第2大贸易伙伴。即使是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2001年，中国对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也达877.5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35.5%。中国和东盟在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日本自2001年开始，内需低迷状态更趋严重，外需将继续成为支持日本增长的主要因素。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日本将面对的是拥有17亿人口、贸易总额达1.3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如利用其先进技术、资金优势和中国与东盟的资源优势以及巨大市场潜力结合起来，将形成日本经济新的增长点。因此，日本通过谈判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非常有利的选择。面对中国与东盟已经做出了实质的行动，美国为了保证本国的利益，有可能放宽日本对东盟的合作，希望通过日本继续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并想办法参与进来，从而使日本对与中国和东盟合作的态度积极起来。

（三）建立由中、日、韩组成的东北亚区域合作体

中、日、韩是东亚地区的核心国家，中、日、韩3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0%，年贸易总额达1.5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2%。三者合作的顺利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东亚地区合作的快慢。3国之间的优势互补性很强，日本和韩国具有技术和资金，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同时3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日本已连续9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是韩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而韩国是日本的第4大贸易伙伴。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3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一直滞后。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才愈来愈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日本开始积极探讨各种区域合作方案，其中，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99年11月，在马尼拉会议上，3国政府同意就3边经济合作问题进行联合研究，并正式在各自国家指定研究所从事这项工作。2000年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10+3”第4次领导人会议上，确立了中、日、韩3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机制。紧接着，2001年11月在文莱领导人会议上，3国就今后定期举行经济、贸易部长会议达成了协议，建立起讨论3国间经济合作的制度框架。2002年9月在文莱召开的第5次东盟—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期间，3国经贸部长举行了首次会晤，正式启动了3国经济贸易部长会晤机制，3方一致认为，加强3国经贸合作势在必行，正式启动中、日、韩经贸部长会晤机制将对3国经贸合作和地区合作、多边合作产生积

的影响。鉴于3国之间制度上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不同，日本目前对与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虽没有与对东盟展开经济合作那样积极，但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将是今后日本区域合作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 与东亚各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鉴于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的长期性，日本为了迅速振兴国内经济，可能对多边自由贸易区保持谨慎态度，先与东亚各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尽快恢复国内经济活力。组建自由区一般都要经过长期的准备阶段，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规定了10年的准备期。而日本经济已经经过了十多年萧条，要求迅速振兴经济的压力很大，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仅耗费时间少，可以迅速进入他国市场，而且可以避开日本一直敏感的农产品问题，因此，日本近期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情有独钟”。日本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就积极推动与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2月日本又开始与韩国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会谈，在韩国之后，下一个目标是香港特区，并通过香港特区寻求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可能。

无论日本选择的是哪一种，主观目的如何，客观上其区域合作政策的趋势都将是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的融合，最终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因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不仅符合世界经济融合的必然趋势，也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日本的出口主要依赖于美国和西欧，随着北美和欧盟各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壁垒日益加强，区内贸易不断增加，日本对北美和西欧的出口愈加困难。而东亚则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潜力的地区，已经隐隐成为世界经济的第3极。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日益增多，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也日趋紧密。2000年，日本与东亚的贸易额创了历史最高记录，达403772亿日元。日本对东亚的投资也几乎占了东亚吸引外资的一半左右。同时“雁行模式”的实施也使日本和东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因此，日本的未来只能在东亚，没有东亚的支持，日本只能是一只“孤雁”。正如日本学者小岛朋之认为的那样：日本除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共生外别无选择。东亚地区经济的再生，也需要包括中日在内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合作，日本必须朝着未来“东亚共同体”和“东亚自由贸易区”这一方向积极参与。因此，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汇编的研究报告《进展中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日本的选择》认为：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组成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可使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1.02%，如果周边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而日本不参加的话，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5%，所以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无论如何选择，都将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为最终目标。

三、日本需要解决的问题

日本虽然曾经提出了不少区域合作构想，但由于日本自身的问题、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对美国的依赖性，使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举步维艰，造成了日本和东亚的区域合作步伐正急速落后于世界上其它地区。因此，日本为了顺利地实施其区域合作政策还需要做出很多努力。

(一) 顺利实现区域合作重心的转移

日本在展开对外经济合作时，需摆正自己的位置，重视审视自己。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提出要“脱亚入欧”。不仅刺伤了亚洲各国的自尊心，也拉大了与亚洲各国的距离。战后，日本认为亚洲国家经济落后，难以为其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出口市场、战略资源和先进技术，在美国的扶持下，向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靠拢。例如其几次提出的“环太平洋经济合作”的构想，都只包括几个少数发达国家而没有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但随着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美国和西欧贸易摩擦的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排挤日本。日本也逐渐认识到日本未来的舞台是在亚洲，如果失去亚洲的信任，不管经济实力多么大，在亚洲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日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处理与东亚各国的关系，真正把立足点放在东亚。以东亚为依托，才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二，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谋求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但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总是推卸责任，并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历史，使东亚各国对日本保持着强烈戒心，限制了日本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作用。而且由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其最终形成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必然是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合作机制，日本寻求亚洲领导地位的行为将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因此，日本应放弃其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东亚各国展开真诚的合作，这才是日本的唯一出路。

(二) 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日两国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在未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中，中日合作关系将是居于主导和轴心地位的。因此能否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能否顺利实施其区域合作政策的关键。

近期，由于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中日贸易摩擦，中日关系陷入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艰难的境地，如果日本再不采取切实行动，改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乃至整个东亚事务都将陷入泥潭难以自拔。日本政府应该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仅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事实上也为日本经济的复苏和东亚的区域合作创造了美好前景。首先，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2大贸易伙伴，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时，对华出口正在成为左右日本景气的重要因素，在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外需”当中的“中国因素”正不断增长，在20年内有望超过“美国因素”。同时，据日本劳动省预测，到2010年，即使是最大限度地雇佣高龄和女性劳动者，仍缺少186万劳动力。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会向日本输出大量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以缓解日本的劳动力压力。其次，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核心大国，与东亚各国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只有中国发展壮大，才能加强与日本的经济交流和合作，正像周总理说的那样：“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不能搞好的。”依靠中日两国结成的稳固的经济合作关系，并通过其凝聚力和辐射力把东亚各国联结起来，才能形成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东亚经济集团。单独的日本是无力与欧洲和北美竞争的。因此，日本如能就东亚区域合作与中国达成共识，则会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改变不合理的分工体制

东亚的国际分工体制一直是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复合体。日本学者称之为“雁行模式”，即以日本为头雁，“亚洲四小龙”为第2列，东盟各国为第3列，日本按这个顺序逐次转移其国内成熟产业。可以说“雁行模式”在东亚的经济起飞中功不可没，但它的存在是以存在技术差距为前提的，在这个模式中，亚洲其他国家要永远跟在日本的后面，这是东亚各国所不能容许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已打破了雁行阵列，而日本经济一直低迷，已无力担当带动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势头的逆转，给“雁行模式”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该年度《通商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模式”时代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因此继续维持“雁行模式”已经不合时宜，日本应按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发展与东亚各国的水平分工，最终实现以水平分工为基础东亚自由贸易区。日本对本区域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也应是多次层的，投资应既有基础工业，又有高技术领域的投资；技术转让要既有一般应用技术，又有高精尖技术，不谋求垄断。

综上所述，日本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应为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负起更大的责任。必须要改变

以往“自私自利”的形象，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真正地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这样才能赢得东亚各国的承认，也为本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 [1] 刘中树. 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研究 [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20，107.
- [2] 刘昌黎、林松海. 90年代的日本经济及日本对外经济关系 [M].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 287.
- [3] 王力军. 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前途坎坷 [J]. 国际经济合作，2002，（9）：42.
- [4] 傅骊元. 新世纪的东亚：合作与发展 [J]. 经济科学，2002，（4）：23.
- [5] 金熙德. “后’雁行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 [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17.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您是第1191207位访问者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林园路1788号
邮编：130012
电话：86-431-5166393
传真：86-431-5166396

E-mail: yuxia@mail.jlu.edu.cn